

晦庵书话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丛书名:现代文学

书 名: 晦庵书话

作 者: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

出版社:学苑音像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05-1-1

ISBN 7-88050-475-3

中国分类法号:I27

定 价: 10.00元

书 话

《守常全集》

《李大钊选集》已经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。全书收作者自 1913 年至 1926 年的论文、演说、杂文、讲义等凡一百三十三篇，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人必须参阅的著作。从这里，我们既可以看到作为初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同志的主导思想，他的较早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，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思潮对他的影响。随着岁月的推移，这种影响在后来的文章里就逐渐缩小，逐渐趋向消灭。《选集》所提供的这条思想发展的线索，和 1949 年 7 月北新书局印行的《守常文集》相比，看来要鲜明得多，丰富得多。我们的确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。

大钊同志的文章散见于报章杂志，生前没有出过专集。1927 年 4 月 28 日在北京英勇就义，当时就曾计划过为他编印选集，可是在那个社会里，荆榛遍野，豺狼当道，又哪里容得了欢呼“新世纪”的声音呢？1933 年，他遇难六周年的时候，北京人民在地下党的支持和领导下，发起为大钊同志募捐，并举行公葬。《守常文集》的稿子也在这个时候编定。原稿分上下两卷，收论文三十篇。鲁迅先生写过一篇《题记》，后来编入《南腔北调集》，文后加上一段短短的附录：

这一篇，是 T 先生要我做的，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 G 书局出版。我义不容辞，只得写了这一点，不久，便在《涛声》上登出来。但后来，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 C 书局去印了，至今没有出版，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，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，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，记此一件公案。12 月 31 日夜，附识。

1939 年 4 月出版《守常全集》封面

所谓 G 书局，就是为鲁迅先生出版《集外集》的群众图书公司。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不久，规定要审查原稿。鲁迅一开始就主张不将《守常文集》送审，不用书店的正式名义出版，印成后自由发卖，免得大钊同志的文章在“检查官”的笔下受刑。磋商未已，北京却有人放出空气，说是群众图书公司规模小，靠不住，这样的书应该委托大书店。一时颇有人随声附和。于是稿子便被转到了 C 书局——商务印书馆。当时商务的当权者是王云五，书稿送审，奉“命”惟谨。一切都不出鲁迅之所料：出版的希望被扼杀了。索回的稿子留在北新书局编辑部。直到抗日战争爆发，大家又想起这个集子，为了避免牵涉旧案，乃改名《守常全集》，于 1939 年 4 月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，由北新负责发行。可是书一露面，立刻又遭“租界”当局的禁止，已经印成的都被没收。十年以后，上海解放，所幸纸版无恙，才又恢复《守常文集》的名称，于 1949 年 7 月印出一部分。重编《李大钊选集》的时候，旧刊散佚，搜集为难，有几篇就直接采自这一版的《文集》。至于《守常全集》，据我所知，外间十分少见。我曾保存一册，1959 年秋北来，临行将原书连同别的一些文献，送给了正在筹备的上海革命博物馆，算是让它有一个妥善的下落。严寒逝矣，春华蓬发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已成为历史的陈迹，现在是连曾经有过《守常全集》的这件公案，似乎也不大有人知道了。

《或外小说》

1956 年 10 月 19 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。回想 1906 年他从仙台回到东京，决计放弃医学，从事善于改变人们精神的文艺活动，到此恰好也是整整五十个年头。那是他一生文学事业的起点。当时计划的文学杂志《新生》虽然没有出版，但封面、插画已经选定，原稿纸也已印好，连准备刊登的文章都动手翻译了，真是万事齐备，只欠东风——一点支持的力量。但是这点力量终于没有找到，《新生》只好告吹。直到 1909 年，得到蒋抑卮的帮助，在东京出版了两册《域外小说集》，总算实现了《新生》的一部分计划。这两册《域外小说集》，无论从鲁迅的文学事业来说，或者从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说，都是早期特别值得珍贵的文献。又因原书流行不多，几乎成了新文学中的“罕见书”，有资格放入新式黄菱圃的“百宋一廬”里去了。

东京版《域外小说集》封面青灰色，上首印长方形希腊图案，书名右起横排，作篆文“或外小说”五字；下端标第几册。极优美。扉页右上角印有两行文字：《域外小说集》第一（二）册，会稽周氏兄弟纂

译。也很别致。第一册出版于己酉2月11日，第二册后4个月，于6月11日印成。版权页上不记公历，当时公历还不很通行；也没有用宣统年号，则因留日学生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推翻帝制的运动，鲁迅是爱国活动的积极参加者。后来他在旧诗里说，“岂有豪情似旧时”，指的就是这时候的少年豪情，印起书来，当然不会用他所反对的“皇历”。书的发行人署本名：周树人；印刷者：长谷川辰二郎；印刷所：神田印刷所；总寄售处：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记街广昌隆绸庄。后马路就是后来的宁波路，广昌隆正是蒋抑卮开的铺子。

鲁迅收在《域外小说集》里的译文虽然只有三篇：安特来夫的《谩》、《默》，迦尔洵的《四日》。但《序言》、《略例》均出其手笔，版式书样，也都亲自厘订。《序言》云：

《域外小说集》为书，词致朴讷，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。特收录至审慎，译亦期弗失文情。异域文术新宗，自此始入华土。使有士卓特，不为常俗所囿，必将犁然有当于心，按邦国时期，籀读其心声，以相度神思之所在，则此虽大涛之微沓与。而性解思惟，实寓于此。中国译界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。己酉正月十五日。

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，很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抱负。那种切切实实，不自矜、不自馁的精神，正是鲁迅一生所坚决奉行的。《略例》所谈各点，亦肇后此主张之端，事虽小而信守勿渝。譬如他喜欢毛边书，自称“毛边党”，这在《域外小说集》就已经开始了：“三面任其本然，不施切削。”他喜欢每页天地宽广，多留空白，《域外小说集》也正是这样实行的：“纸之四周，皆极广博，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。”卷末附录作者小传及注释，供阅读时参考，后来编辑《译文》杂志，仍然按此办法进行。凡有从实践中得来的好的主张，一定坚持到底，真所谓数十年如一日。至于对各国人名通例，详加解释，连标点符号的用法，亦一一介绍，更可见开垦者筚路蓝缕的苦心。

根据鲁迅后来的回忆，《域外小说集》第一、二册在东京只卖去二十册，在上海也不过二十册左右。“于是第三册只好停版，已成的书，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。过了四五年，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，我们的书和纸版，都连同化为灰烬；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，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。”从这个统计看来，东京版《域外小说集》流行于人间的，似乎只有四十部左右。但其实不止此数。鲁迅每印一书，常好持赠知音，而蒋抑卮回国后，也曾托浙江省立图书馆大批捐赠，在卷首空页上盖一印云：“浙江省立图书馆辅导组代绍兴蒋抑卮先生捐赠”。我曾从别的图书馆里看到。世有识者，当能珍重地保留着这部佳籍的吧。

1920年，上海群益书社曾将一二册《域外小说集》合排，重印出版，虽篇什增加，而书品则远不如前矣。

科学小说

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6年及1958年先后出版了《格兰特船长的儿

女》和《神秘岛》，作者是法国的儒勒·凡尔纳，他是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家，所有作品，极受青年欢迎。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、《海底两万里》和《神秘岛》统称为凡尔纳的三部曲。他在作品里不但培育年轻人勇敢冒险的精神，而且灌输了许多科学知识。凡尔纳的著作和《江湖奇侠传》、《五十年后之新世界》等不同，由于作者知识非常丰富，一切叙述多有科学根据，因此他的幻想往往成为极有趣的预言——科学世界的预言。

儒勒·凡尔纳（Jules Verne）这个译名根据的是法语发音，看起来有点陌生，其实，他倒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家之一。1902年，梁启超创办《新小说》，从创刊号起，就登载了他的《海底旅行》，译为南海卢藉东，由东越红溪生润文。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，一个人照译原文，由另一个长于词藻的人替他修改润饰，发表时一同署名。儒勒·凡尔纳的姓名当时被译为“萧鲁士”，大概是根据英语发音译了 Jules 一字，汉化了他的姓名。后来商务印书馆的《说部丛书》也介绍过他，作者的姓名被译成为“焦士威奴”，那却是两个字连译，但根据的仍然是英语发音。至于他的作品之所以为中国读者熟悉，主要还是因为鲁迅先生译过他的两部作品，那就是：《月界旅行》和《地底旅行》。

《月界旅行》出版于1903年10月，进化社版，当时采取卖稿的方式，所以只混称“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”，没有具上译者的姓名。但原作者却被误作美国培伦，序文里说：“培伦者，名查理士，美国硕儒也。”鲁迅先生是从井上勤的日译本重译的，看来日译本也是根据美国出版的英译本重译，所以把作者当作美国人；又因日本人念齿唇音的“V”为唇音的“B”，把 Jules Verne 译成为查理士·培伦，越来越像一个美国人的姓名了。《月界旅行》日译本分二十八章，鲁迅缩成十四回。《地底旅行》出版于1906年3月，凡十二回。第一回及第二回曾在《浙江潮》杂志上发表，译者署名之江索士，这是鲁迅先生早年用过的笔名。后来由启新书局出版，三十二开本，较《月界旅行》略小，彩色封面，形式和当时小说林社出版的书籍很相像。作者的译名是“威男”，这是 Verne 的音译，但籍贯又被误成为英国，大概还是因为日译根据的是英译本的缘故吧。这样，儒勒·凡尔纳在中国读者的记忆里，就有了三个国籍，这是亟需为之订正的。

凡尔纳生于1828年，殁于1905年。如果根据我们今天的科学发明回过头去看一他的著作，有许多地方的确值得我们惊讶。同时，他的某些作品里反对人压迫人，提倡社会公道和人类正义的精神，也是使我们深深地为之感动的。清朝末年，许多人倡导西洋文明，但往往着重于猎奇和空想，所谓神秘小说、幻想小说、电术小说等等怪名称，充斥于出版界。一般人都把西洋末流作品，奉为珍宝。在这种蔚然成风的环境里，鲁迅独能力排众议，披荆斩棘地选出凡尔纳的两部作品，介绍给迫切地需要科学知识的中国青年，这种眼力，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倾倒，值得我们佩服的。

《月界旅行》和《地底旅行》因为出版较早，在鲁迅译著单行本中，很不易得到。我寻找多年，一直没有获睹庐山真面目。1954年冬，上海书商从浙江镇海乡下觅得《月界旅行》一册，携来求售，索价奇昂，踌躇再四，终于还是把它买了下来。不久，上海鲁迅纪念馆也购得了《地

底旅行》一册，为了使两书能够相映成辉，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时，我就把这册《月界旅行》送给了新建的鲁迅纪念馆，使鲁迅先生所译的儒勒·凡尔纳的作品，能够同时展出，合成完璧，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心愿。

闲话《呐喊》

《呐喊》原为新潮社“文艺丛书”的一种，共印两版。第三版起，改由北新书局发行，列为《乌合丛书》之一。新潮社初版本《呐喊》于1923年8月出版，当时《文艺丛书》已经出了两种，一是冰心的《春水》，二是鲁迅翻译的《桃色的云》，《呐喊》按次序该是第三种。新潮社各书纸质精良，装帧讲究，《呐喊》用大红封面，在当时可说十分别致。初版收小说十五篇。这些小说在结集之前已经享有盛誉，因此书一问世，立刻销售一空。同年12月再版，内容仍旧，只是印刷者京华印书局却改为京师第一监狱。以监狱而承办印务，看来有点古怪，可是说句笑话，鲁迅先生和那时的“囚犯”偏偏特别有缘，现在阜成门内西三条故居里，还保存着一些桌椅，也是监狱的产品。书籍的影响自然不同于家具。后来北洋军阀逮捕持有《呐喊》的青年，问罪的证据有两点：一，封面“赤化”，二，承印的人是“囚犯”。在“官”们的眼里，很显然，这两者已经被莫名其妙地联系起来了。

北新版的《呐喊》用的是原纸型，惟一的区别在封面。中间黑方块里用铅字排印的书名和作者署名，这回都由鲁迅先生亲自写成图案字，比原来的为大，不过因为总的布局没有更动，如果不把两种版本放在一起，粗心的读者一时是看不出来的。至于内容的改变，则是在《创造季刊》第二卷第二期（1924年1月）发表了成仿吾《〈呐喊〉的评论》以后，前后经过，鲁迅在《故事新编》的序文里已经谈得很清楚。他抽去了最后一篇《不周山》，根据自述，直接的原因是这样：

《不周山》的后半是很草率的，决不能称为佳作。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，一定自误，而我也成了误人，于是当《呐喊》印行第二版时，即将这一篇删除；向这位“魂灵”回敬了当头一棒——我的集子里，只剩着“庸俗”在跋扈了。

仿吾在文章里曾借用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话，说批评是“灵魂的冒险”，鲁迅的答复针对了对方的意见。至于说当《呐喊》“印行第二版时”，抽去了《不周山》，这“第二版”指的是重排的时间，即1930年1月北新版第十三次印刷的时候，离仿吾的发表批评已经整整六年。《呐喊》作为《乌合丛书》之一，自1926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为止，先后印行了二十余次，可以看出这部书受欢迎的程度。

鲁迅自己对创作的要求是严格的，例如关于《不周山》的评价就十分认真。不过《不周山》也自有其本身的特点，不能说成仿吾的评论没有一点道理。我觉得这篇小说放在《呐喊》里的确不很调和，后来改名《补天》，作为《故事新编》里第一篇，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，一种很重要的尝试。《呐喊》出版后，评论、读后感之类出现了不少，有一部

分收在未名版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》（后归开明）和北新版《鲁迅论》里。现在看来，这些评论有许多不仅未必精当，而且往往含有偏见。也有一二篇值得参考的，例如雁冰（茅盾）的《读 呐喊 》，对《狂人日记》分析得较为深刻，他还指出：“《呐喊》里的十多篇小说，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，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，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。”不但道出了鲁迅在艺术上的刻苦探求，同时也说明他作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。我以为这个提示十分重要。我们需要系统地分析《呐喊》的创造，研究一个先驱者拓荒开来的功劳。对于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来说，这一步是不能不做的。几时才能让我们读到一部这样的著作呢？

半农杂文

1934年7月14日刘半农先生逝世后，杂志如《人间世》、《青年界》曾替他出过纪念特辑，蔡元培、鲁迅都写了文章。鲁迅先生写的是《忆刘半农君》，称道他《新青年》当时的功绩，譬如答王敬轩的双簧信，“她”字和“牠”字的创造等等。我觉得这是所有纪念半农文章里最好的一篇，不掩瑜，不溢美，句句道出了半农的为人。最后几段说：

近几年，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，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；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“密斯”之类，却很起了反感：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。从去年来，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，弄烂古文，回想先前的交情，也往往不免长叹。我想，假如见面，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，不给一个“今天天气……哈哈哈”完事，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。

不过，半农的忠厚，是还使我感动的。我前年曾到北平，后来有人通知我，半农是要来看我的，有谁恐吓了他一下，不敢来了。这使我很惭愧，因为我到北平后，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。

现在他死去了，我对于他的感情，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。我爱十年前的半农，而憎恶他的近几年。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，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，他的为战士，即使“浅”罢，却于中国更为有益。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，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。

这篇文章作于1934年8月6日，距半农之死约半月余。感怅无地，读来十分沉痛。到11月30日，周作人写了一篇《半农纪念》，发表在同年12月20日出版的《人间世》第十八期上。其中有一段说：

还有一首打油诗，是拟近来很时髦的浏阳体的，结果自然是仍旧拟不像，其辞曰：

漫云一死恩仇泯，海上微闻有笑声。
空向刀山长作揖，阿旁牛首太狰狞。

半农从前写过一篇《作揖主义》，反招了许多人的咒骂。我看他实在并不想侵犯别人，但是人家总喜欢骂他，仿佛在他死后还有人骂。本来骂人没有什么要紧，何况又是死人。无论骂人或颂扬人，里边所表示出来的反正都是自己。

此诗此文，据说都是为鲁迅而发的。抹煞事理，如此其极，想起来真不免令人毛发悚然。鲁迅所说的双簧信和“她”与“牠”的创造，周作人所说的《作揖主义》，以及半农后来禁呼“密斯”的文章，都见于《半农杂文》。《半农杂文》分第一册与二集两本。第一册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，1924年6月发行，道林纸印，十八开大本，卷首附作者小影两帧，第二帧且为彩色。自序一篇，三号仿宋字排。正文四十五篇。从这些文章看来，半农确是战斗过来的。《奉答王敬轩先生》和《作揖主义》，都是对旧礼教旧道德极猛烈的攻击，想不到一经举引，竟成了两个极端。这本书在上海方面，曾由开明书店代售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侵略军进占整个上海，当时书店尚有存书，但其中《悼“快绝一世徐树铮将军”》一文，代售者害怕文字狱，应市时已经撕去。我生平最讨厌这种残本，并且也想知道这位曾经为林琴南所期望的“荆生将军”小徐被暗杀后，半农为什么哀悼他？哀悼为什么又竟犯忌？于是辗转托人，才从书栈里找出一册完整本。原来半农在那篇文章里，说明死的悲哀，不在于本人，而在于关系人。徐树铮一死，应该致唁的倒不是他本人，而是另外四种人。第一种是白宫里的那位“内外感”圣人；第二种是国外国内的一班欢迎欢送，忙得屁滚屎流的阔老；第三种是他的一百多个随员、顾问、翻译、参议，下至无量数的二爷三小子之类；第四种呢？他说：

最后，便是东方的那一个贵国了！本年12月25日，居留天津的该贵国人所办的《天津日报》，登了两段新闻，一段的题目是《叛将郭松龄最后》，又一段的题目是《快绝一世徐树铮将军》。哈哈，其喜可知，其喜可知！乃曾几何时而“快绝一世”四字竟成讖语！而可怜敝国的天，又不能赶快加工，替贵国在五分钟之内造出同样的一个鞠躬尽瘁的忠臣来，这不是糟尽天下之大糕么！我们对于该贵国，也该重重重重重重重重.....的致唁！

自然，这对于当年的“友邦”和彼时的敌人是很不敬的，这本书便不得不遭到剜心的惨刑。至于《半农杂文二集》，则于1935年7月半农逝世周年忌的时候，作为遗著，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。文前也插照片两页。全书收正文四十九篇，门人商鸿逵序一篇。此书为《良友文库》之八，四十八开小本，和星云堂的一比，大小悬殊，插在书架上，一高一低，一厚一薄，看上去实在很不舒服。不过半农的文章，读起来却是使人十分畅快的，既流利，又幽默。有人说他有举重若轻的本领，“清淡时有如微云淡月，浓重时有如狂风急雨。”这句话说得很中肯。不过幽默易流于浮，流利易流于滑，有时不免有这种毛病。但就大体而论，半农的杂文很是泼辣，证明他应该是一个战士而不应该是一个打油诗人。他的文体，正如他的诗歌一样，值得特别提出来研究研究。

撕碎了的《旧梦》

1944年8至9月间，徐调孚同志曾以陈时和笔名，在柯灵主编的《万象》上，写过一篇《新录鬼簿》，专谈已经逝世的几位作家的逸事，其中被提及的，第一个是鲁迅，第二个是刘大白。调孚还替大白开列了一个著述书目，共计十八种。已刊的十六种，未刊的二种，说明大白先生的确是一个“多方面的人”。但在这十八本书里，诗和有关于诗的计十种，占全部著作半数以上。这样看来，说大白是一个“多方面的人”固然可以，说大白是一个诗人，或者也不算为过吧。

大白著作中，最早印行的是诗集《旧梦》，《旧梦》出版于1924年（扉页作1923年11月，误），列为《文学研究会丛书》之一。商务替文学研究会出过不少书，多为三十二开本，有几本诗集却为四十开狭长本，这个集子便是其中之一。全书左起横排，计五百页。骤眼望去，厚厚一册，简直和学生小字典一样。作者在《付印自记》里提到自己诗作的缺点，第一是“用笔太重，爱说尽，少含蓄。”第二是“传统气味太重”。细读《旧梦》，的确使人有这样的感觉。

原来，大白本名金庆桢，字伯贞，清朝举人。辛亥革命以后，更姓名为刘靖裔，字大白。他在上海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上发表文章，有时也署名“汉胄”。大白先生旧学根底极好，而反对传统影响亦最烈。他称文言为“鬼话文”，白话为“人话文”。可是自己的诗文又往往摆脱不了这种过去的羁绊，“你要向前，因袭却要你朝后，”正是他自我剖白的痛苦经验。商务版《旧梦》印刷粗糙，错误百出。例如有一首《梦之怀疑》，诗题竟倒印为《疑怀之梦》。对于当时迷信大书店的人，实在是当头一棒。后来，这本书由开明书店改版重印，分作四册，书名分别为《丁宁》、《再造》、《秋之泪》、《卖布谣》。重印本初版每本书后各附跋文《撕碎了的旧梦》一篇。这个题目具有双关意义，一方面说明往事不再，一方面也指出收在这四个集子里的诗篇的由来。改版本于1930年1月起陆续印出，删去原书序文序诗。书内剔除、添补、移动、订正的地方不少。作者自述重印的动机是：

并且，印成的《旧梦》，有些是模糊的，有些是零乱的，有些是颠倒的，有些是舛错的，有些是拼衍的，有些是漏略的；它底排列，它底剪裁，它底收束，没有一点不给人们以不愉快的印象。印成的《旧梦》，这样地使人不愉快；《旧梦》中所写出的旧梦之影，也未必能给人以愉快的印象了。

“五四”运动时候，大白先生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当教员，他虽然是前清科第中人，而鼓吹新文化不遗余力，一时称为骁将，且不免有过火的地方。例如刘半农创造“她”字，他也接着创造了一个男性第三人称的字，而把“他”作为两性通称。这个建议后来为实践所否定，并未通行。他还镌有一个图章，叫做“寻常百姓”，用来钤在书上。1927年以后，刘大白弃教从政，由教育部次长而至代理部务，既据要津，渐忘来路，他不但自藏锋铓，而且一切作为，也已非“寻常百姓”。“撕

碎了的旧梦”，看起来，到此又要重“撕”一番了。

《童 心》

作为《文学研究会丛书》里的诗集，开本和《旧梦》一样，尚有王统照的《童心》、朱湘的《夏天》和梁宗岱的《晚祷》。商务书版，大都毁于“一·二八”炮火，以后重印，版权页上一律注明“国难后”第几版，留此数字，以志不忘，倒也颇有意思。上面说的诗集四种，后两种都曾重印，惟《旧梦》和《童心》久已毁版，极为难得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我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购得《旧梦》，几天后又在同一个地方买到《童心》。一时高兴，在空页上加了几句题记，并曾作为《书话》之一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，其中有这样的话：

《童心》为剑三最早诗集，收1919年至1924年诗154首，前附《弁言》小诗一首。此书出版于1925年2月，去今已20余年，剑三亦垂垂老矣。龚定庵诗云：“瓶花帖妥炉香定，觅我童心廿六年。”北望齐鲁，战火未已。念此白头诗人，真令人有无穷的感慨，无穷的感慨呵！

剑三是王统照先生的字。当时和谈破裂，蒋介石积极发动内战，后面几句，指的正是这个。《书话》发表后，剑三自青岛寄来一律，题曰：《谢晦庵君》，附注：“1948年10月作于海滨”。全诗如下：

旧稿飘零刊本残，谢君拾掇自荒摊。
童心愿化春泥种，往事难如蜡泪干。
北国鼓鼙萦梦寐，平生意想剩华颠。
西窗何日同听雨？樽酒论文忘夜阑。

提起“樽酒论文”，里面有一段故实。原来抗日战争初期，我们都留居上海。蛰处一隅，时相过从。当时常在一起的还有西谛、柯灵、长简、健吾、西禾诸人。剑三和西谛都喜欢喝酒。有时相聚小酌，快谈古今，一直到夜阑才踏月归去。后来剑三北归，我们几个人为他饯行，他在席上也做过一首诗，加题曰《将北归赋此以示诸友》：

蹉跎十载负江南，双鬓徒赢雪色添！
梦寐海隅思钓咏，园林故里竞戈鋌。
飘凌空有逍遥羨，艰悴深知来复缘。
敢向人天存怨想，尚拟努力补华年。

未署恂如。剑三对于新旧诗都有造诣。《童心》以后，又出过《这时代》（1933年3月）、《她的生命》（1934年12月）、《夜行集》（1935年11月）等诗集。其中以《这时代》最受读者欢迎。他还自费印过一册译诗，这就是线装的《题石集》，于1941年出版。除此以外，我觉得尚需提及的是：当他在上海为一家晚报编副刊时，曾写过许多散文

诗，总题《炼狱中的火花》，于1939年7月由世界书局出单行本，列为《大时代文艺丛书》之一，书名改为《繁辞集》，作者署名容庐。因此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是王统照的著作。全国解放后，他兴致勃勃，曾函邀我往山东大学教课，我因事未能成行。这一时期，他又写了许多诗，出了好几本诗集。“力补华年”，正是恢复“童心”之期。可惜如今故人谢世，墓木且拱；往事如昨，而我已无法再践“樽酒论文”之约了！

朱自清

朱自清先生逝世后，叶圣陶先生在《中学生》第二〇三号上，写了一篇哀悼文章，题曰《朱佩弦先生》，中间有一段说：

他早期的散文如《匆匆》《荷塘月色》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，都有点儿做作，太过于注重修辞，见得不怎么自然。到了写《欧游杂记》《伦敦杂记》的时候就不然了，全写口语，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，虽然有时候还带有一点文言成份，但是念起来上口，有现代口语的韵味，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，不是不尴不尬的“白话文”。当世作者的白话文字，多数是不尴不尬的“白话文”，面貌像个说话，可是决没有一个人的口里真会说那样的话。又有些全从文言而来，把“之乎者也”换成“的了吗呢”，那格调跟腔拍却是文言。照我们想来，现代语跟文言是两回事儿，不写口语便罢，要写口语便得写真的口语。自然，口语还得问什么人的口语，各种人的生活经验不同，口语也就两样。朱先生写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口语，念给劳苦大众听未必了然。但是，像朱先生那样切于求知、乐意亲近他人，对于语言又有敏锐的感觉，他如果生活在劳苦大众中间，我们料想他必然也能写劳苦大众的口语。话可要说远了，近年来，他的文字越见得周密妥贴，可是平淡质朴，读下去真个像跟他面对面坐着，听他亲亲切切的谈话。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，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，谈到文体的完美，文字的全写口语，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。

这段话说得很有意思，所以我不惮烦地把它抄录下来。佩弦先生的《背影》、《荷塘月色》、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，是被称作早期散文里的代表作的，论文字，平稳清楚，找不出一点差池，可是总觉得缺少一个灵魂，一种口语里所包含的生气。到了《伦敦杂记》，所用几乎全是口语，——圣陶先生说的知识分子的口语。逐句念来，有一种逼人的风采，使你觉得这确是佩弦的话，确是佩弦的口气，那么亲切，那么诚恳。只要你肯听，便叫满怀忿忿，也不会不慢慢地心平气和，乃至倾耳入神，为他一句一点头呢。这是佩弦先生文字的魔力。不过我还有一点想法，我觉得佩弦先生晚年文章偏于说理，尚论情致，却似乎不及早年；不过思想成熟，脚步坚实，再加上语言上的成功，这些地方远非早年所可比拟而已。试拿后期出版的《伦敦杂记》（1943年）、《诗言志辨》（1947年）、《标准与尺度》（1948年）、《论雅俗共赏》（1948年）和早期出版的《踪迹》（1924年）、《背影》（1928年）、《你

我》（1936年）校读一番，这差别是立刻可以看出的。而《你我》正是前后的转折点。圣陶先生从语言角度评述佩弦先生的散文，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。我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。我觉得提倡散文，“五四”以后的作品还有许多优秀的传统值得注意。从语言来说，现在有许多作家的语言已经超越了“五四”初期的作家。在艺术上，语言是文学的根本问题，却并不是它的全部问题。有些散文语言很好，甚至还很有个人特点，然而却不一定都有情致。佩弦先生后期语言比前期更接近口语，但人们还是爱读他的《背影》、《荷塘月色》，这是有原因的，不能够像有些人那样简单地用小资产阶级感情共鸣来解释这个现象。从用文言还是用白话的观点上，我们不想提倡旧体诗词，但人们还是喜欢读旧体诗词，写旧体诗词，而且有些旧体诗词的确写得很好，这里面有个同样的道理。研究朱自清后期散文的语言，注意朱自清前期散文的情致，我们将会更清楚地了解朱自清的风格。

走向坚实

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4月出版了一册许地山的小说集，书名《危巢坠简》，由郑振铎题封面。这是地山先生逝世后出版的遗稿。地山先生的文艺作品本来已经由商务出版过两册，列为《文学研究会丛书》。第一册《缀网劳蛛》，收小说及散文十二篇。第二册《空山灵雨》，收散记四十四章。用的都是落华生名义。《危巢坠简》虽系新出，其实半数以上还是旧稿。其中第一篇至第八篇，曾以《解放者》为书名，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，于1933年4月发行，道林纸印，留有毛边。并且还附了一个独幕剧：《狐仙》。改版重编时删去《狐仙》，另收新作六篇，就是第九篇至第十四篇，都为后来陆续写出而未曾收集的作品。卷首《弁言》，也还是在《解放者》一书里用过的，表达了他对艺术的一些见解。《危巢坠简》书前多了一篇周俟松——他的夫人的序文，其中第二段说：

任何一个人，只要觉得自己的精力，应该为大众服务的时候，他越是不重视他个体的存在，更不会把自己的生死线看得那么分明。在我们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上，觉得地山晚年比过去更为紧张，不论这桩事或那篇文章，他都赶着做，新的任务又纷沓杂来，于是对于自己已成的文章，往往无暇去整理。现在，我虽想搜集所遗佚的，已无从去找了。所以，本书还不能算是他小说的最后遗集。

许地山先生对梵文造诣极深，致力于学术工作，有一个时期文艺作品写得不多。他在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，更努力于中国语文的改革，提倡拉丁化运动。抗日战争爆发，他积极鼓吹抗战，深受青年爱戴。他的早期作品多少带些宗教影响下的悲观色彩。所谓“生本不乐”的观点，贯串着他的许多著作。茅盾先生曾写过一篇《落华生论》，说他是一个怀疑论者，但从《春桃》开始，却在渐渐地走向坚实。这句话说得不错。《春桃》以后，如《无法投递之邮件》和《铁鱼底鳃》，都表现了积极的充满民主精神的思想。《玉官》一篇，且在艺术形式上有所探索。诚如周俟松说的，小说一般都离不开对话，地山在这里却摒弃不用，通过

叙述和描绘反映人物的思想感情，在艺术欣赏上给人以非常新鲜的感觉。在“五四”一辈作家中，许地山和朱自清，尽管有许多地方很不一样，但思想逐渐走向坚实，艺术逐渐趋于成熟，而仍不放松追求和开拓，彼此却有一致的地方。这就是当我们谈到朱自清，就不能不想起许地山的原因。

乡土文学

1948年10月，中兴出版社刊行了沪版《愤怒的乡村》，这是王鲁彦先生的长篇小说，由《野火》改名而来。《野火》原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发行，于1937年5月出版，列为《良友文学丛书》之三十八。不久，抗日战争爆发。“八一三”以后，良友已逼近火线，图书狼藉，饱饫铁蹄。这本书流到读者手里的并不很多，在内地改名出版，原因或者就在于此。对于鲁彦的小说，比起长篇来，我似乎更喜欢他的短篇，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有《柚子》（北新版）、《黄金》（人间版）、《童年的悲哀》（亚东版）、《小小的心》（天马版）、《屋顶下》（现代版）、《雀鼠集》（文化生活版）、《河边》（良友版）。听说抗战时在内地还出过一本《伤兵旅馆》，我却没有见到。早期短篇经过作者自己的挑选，较优秀的都收入了开明版的《鲁彦短篇小说集》。同时，我又很喜欢鲁彦的散文，他的散文集有《驴子和骡子》（生活版）、《旅人的心》（文化生活版）、《婴儿日记》（生活版）等数种。平实中带着回荡，很有个人风格。有人以为鲁彦的作品是模仿鲁迅的，茅盾先生却指出了他们之间一个根本的差别，主要表现在人物创造上。他说：

……我总觉得他们和鲁迅作品里的人物有些差别：后者是本色的老中国儿女，而前者却是多少已经感受着外来工业文明的波动。或者这正是我的偏见，但是我总觉得两者的色味有些不同；有一些本色中国人的天经地义的人生观念，曾是强烈的表现在鲁迅的乡村生活描写里的，我们在王鲁彦的作品里就看见已经褪落了。原始的悲哀，和Humble生活着而仍又是极泰然自得的鲁迅的人物，为我们所热忱地同情而又忍痛地憎恨着的，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是没有的；他的是成了危疑扰乱的被物质欲支配着的人物（虽然也只是浅淡的痕迹），似乎正是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时应有的人们的心理状况。

这段分析的确抓住了要害。茅盾又说鲁彦的作品教训主义色彩太浓，我看这又是他和鲁迅在艺术手法上的差异。在鲁彦的小说里，客观的叙述往往搀和着主观的抑制，缺少鲁迅所常有的明锐和机智。所以，我们读鲁迅的小说时觉得有辛辣的风趣，鲁彦的小说就不免有些沉闷的感觉了。他所描写的人物大都是乡村的小资产阶级、知识分子和农民，取材不离故土，因此被人称为乡土文学家。这种乡土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很深的根基。“人情同于怀土”，大恋所存，固不仅鲁彦而已。在鲁彦的短篇集子里，我最爱读《屋顶下》和《河边》两册。《屋顶下》出版于1934年4月，为《现代创作丛刊》之十五。《河边》则为

《良友文学丛书》之三十五，于 1937 年 1 月出版。世事变易，岁月匆匆，鲁彦已成古人。作者所期待的“野火”，不仅早已在他曾经描写过的土地上燃烧，而且连愤怒也早已转为欢腾了。

革命者！革命者！

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，哀悼他的文章里，没有一篇不提到他是诗人，知一多为诗人者，又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有诗集曰《死水》和《红烛》。《死水》出版于 1928 年 1 月，新月书店发行，收诗二十八首，格律整饬，和当时“新月派”其他诗人相似。但不拘于个人情感之得失，把反动统治下的生活比作死水，对现实社会深致不满，则又卓然独立，和许多人不同。他的另一个诗集《红烛》出版于 1923 年 8 月，由泰东图书局发行，封面白底红字，用蓝条框边，装帧粗俗，殊不美观。集内收序诗《红烛》一首，《李白篇》三首，《雨夜篇》二十一首，《青春篇》十七首，《孤雁篇》十九首，《红豆篇》四十二首。《红烛》各诗在形式上不及《死水》，而热情磅礴，意气焕发，攻击旧礼教甚力。序诗有云：

红烛啊！
既制了，便烧着！
烧罢！烧罢！
烧破世人底梦，
烧沸世人底血——
也救出他们的灵魂
也捣破他们的监狱！
红烛啊！
你心火发光之期，
正是泪流开始之日。

.....

红烛啊！
你流一滴泪，灰一分心，
灰心流泪你的果，
创造光明你的因。
红烛啊！
“莫问收获，但问耕耘！”

诗中充满个人牺牲的情调，这是诗集的序诗，实际上也是一多先生生命的序诗。细细吟味，则知他后来为民主尽力，为国家殉难，决不是偶然的事情。在现代文学史上，原来是右翼或者接近右翼，终于变成左翼的人是有的，原来是左翼或者接近左翼，终于变成右翼的人也是有的。至于摸索道路，稳步前进，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，一旦“知了”以后，倾心真理，虽粉身碎骨而在所不辞的人，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并非少数。一多先生说自己的生命是从四十岁才开始的。以今日之我去否定昨日之我，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够轻松地愉快地做到。这里需要有一点勇气，有一点毅力，也要有一点前因后果。一多在探求新诗格律

方面作出过重要的贡献，在这点上，他和“新月派”诗人接近，而且的确曾经是“新月派”中的一个。但作为诗人的内核，从《红烛》序诗所反映的思想分析起来，即使在前期，我们也很难以对“新月派”的理解不加区分地来理解闻一多。“莫问收获”固然近于诗人气质，“但问耕耘”却已昭示了他作为战士的特色。革命者！革命者！固不仅诗人已也。

诗人朱湘

《文艺复兴》第三卷第五期（1947年7月1日）有一个《闻一多逝世周年特辑》，发表了一多遗著《神仙考》，文末附有朱自清短跋，说明他整理这篇稿子的经过，现在看来实在很是难得。还有更难得的是：这个特辑又发表了朱湘遗著《闻一多与死水》一文。这篇稿子是朱湘作客清华园时所作，当时为一多看到，阻止发表，说是要等他死了以后才允许公开。这样，稿子就由别人收起并且保存下来了。朱湘不久自杀，一多后来又惨遭国民党特务谋害，稿子才由保存者送给《文艺夏兴》发表。以诗人论诗人，的确有许多独到之见。

子沅（朱湘）处身在过去那个社会里，一生愤世嫉俗，落落寡合，终至投水自杀。很多人把他的诗和“新月派”的诗相提并论。从字锻句琢这一点看来，的确有点相似，尤其是和一多相似。但“新月”一派作品里，很少有子沅的凄苦和幽愤。子沅生前出过三个诗集：《夏天》（1925年1月）、《草莽集》（1927年8月）和《石门集》（1934年6月）。他在编辑《石门集》的时候，还决定另编一本《永言集》，已经辑集了一部分诗稿。他逝世后，才由赵景深代为编成。《永言集》于1936年4月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，列为《新诗库》第一集第六种。在这些诗集里，我最喜欢的是他的《草莽集》。要研究朱湘的思想，我觉得还可以读一读他的书信。他生前出过一册《海外寄霓君》（1934年12月），收他给霓君夫人的信九十通。后来，罗念生于他死后又辑了一本《朱湘书信集》，于1936年3月出版，全书收他给友人的信八十六通。从这些信里，可以看出子沅贫困流连但又正直严肃的一生。他和别人讨论过诗，讨论过科学，讨论过人生问题，嘻笑怒骂，率性见真。因此，“他很需要朋友，又爱得罪朋友。”许多人都说他狂妄，同时不得不承认他的狂妄是一种严肃的狂妄。这种个性是旧社会的产物，可是旧社会又从来容不得这种个性。这便是诗人朱湘的命运。

两本散文

梁遇春别署驭聪，又名秋心，擅长译事，所译文艺作品凡十余种，但他自己的著作，却只有散文两册：曰《春醪集》，曰《泪与笑》。后一书且为遗作，出版之日，距作者之死已两年矣。遇春所著不多，而才思横溢，每有掣胜之笔。《春醪集》出版于1930年3月，由北新书局发行，收散文十三篇，如《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》、《醉中梦话》、《人死观》、《“还我头来”及其他》、《“失掉了悲哀”的悲哀》等，一看题目，就知道作者苦思竭虑，对人生进行着不断探索，真有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味道。卷首有序，自叙春醪题名，出于《洛阳伽蓝记》里

游侠所说的话：“不畏张弓拔刀，但畏白堕春醪。”结末说：

再过几十年，当酒醒帘幕低垂，擦着惺忪睡眼时节，我的心境又会变成怎么样子，我想只有上帝知道吧。我现在是不想知道的。我面前还有大半杯未喝进去的春醪。

这篇序文作于真如，当时他在暨南大学当助教。不久北上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事。遇春所谓“再过几十年，当酒醒帘幕低垂”，不料三年后就与世长辞，这杯酒未免喝得太早，醒得太快了。废名把他未问世的《泪与笑》带给在上海的石民，希望找个出版机会，寄来寄去，结果还是由废名寄给开明书店，于1934年6月出版。全书收散文二十二篇。序三，废名、刘国平、石民作。废名说他“文思如星珠串天，处处闪眼，然而没有一个线索，稍纵即逝。”这句话说得颇有见地。遇春好读书，且又健谈，对西洋文学造诣极深。看的驳杂，写来也便纵横自如。鲁迅先生曾说“五四”以来“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”。就风格而言，有的雍容，有的峭拔，有的明丽。遇春走的却是另一条路，一条快谈、纵谈、放谈的路。他爱思索，爱对自己辩论，有时带着过多感伤的情调，虽说时代使然，却也不能不是他个人的缺点。但他毕竟是严肃的，对生活作过认真的思考。我觉得在进步的道路上，最可怕的是浑浑噩噩，浮浮沉沉，小注即满，油滑自喜。如果是一个认真的人，不管他过去怎样感伤，活到现在，他是会对生活找到应该找到的结论的。不幸遇春早年夭亡，我们只能把他当作一个文体家，而且即使作为文体家，跟着遇春的逝世，这条路不久也荒芜了，很少有人循此作更进一步的尝试。我喜欢遇春的文章，认为文苑里难得有像他那样的才气，像他那样的绝顶聪明，像他那样顾盼多姿的风格。每读《春醪集》和《泪与笑》，不免为这个死去的天才惋惜。但我相信：我们终于将会出现这样的散文，这样的风格，而并不带有梁遇春式感伤的情调。

骈肩作战

一提起30年代文艺界的思想斗争，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（简称“左联”），在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下，它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组织。“左联”的成立早于“文总”，在开始阶段，几乎兼负着“文总”的任务；到了后来，又一直和兄弟组织如“剧联”、“美联”、“记者联”等协作得很好。“左联”活动面广，领导的刊物多，曾经打了几次大仗，因此影响十分深远。当然，除了“左联”之外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（简称“社联”）的功劳。“社联”主持的刊物在数量上并不少于“左联”，不过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更为直接，刊物的寿命更短，往往出了一期即被禁止，只得改名重来。在思想斗争上，例如对胡适《我们走那条路》（即所谓“五鬼闹中华”）的批判、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等等，同样是毫不含糊地打得十分漂亮的大仗。

“社联”成立于1930年5月20日，比“左联”迟两个半月，比“文总”早一个半月。其中有些人同时又是“左联”的成员。我觉得30年代